

刘智明

儿童文学作品选

北 京 出 版 社

目 录

序·····	张天翼 (1)
摄影记·····	(1)
在音乐课堂上·····	(18)
山重山·····	(24)
一颗很小的星·····	(39)
绿色钱包·····	(57)
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	(83)
两个耳光·····	(141)
夏天的预报者·····	(150)
啊, 我亲爱的大河马·····	(156)
星星火炬·····	(162)
小雁齐飞·····	(226)

我的“根”在学校…………… (295)

——代后记

摄影记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下午，刚从郊区回到编辑部，组长老黄就让我去动物园，给新来的一只小黑猩猩拍照。照片明天要见报，真够紧急的！

我匆匆忙忙登上公共汽车，才发现相机里只剩下一张空底片了。没关系，只要到时候稳扎稳打，还怕不能一次拍成？

谁知道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倒楣事，使我两年来第一次没完成任务！

学校正放暑假，动物园简直成了孩子的天下。他们象一群群小喜鹊，东奔西跑，又吵又闹，把燥热的空气搅得更加燥热了。

一进园门，就有个男孩子粘上我了。他大约十一二岁，穿着红背心、蓝短裤，腰带耷拉着一截；浑身是土，象个小土地爷；毛茸茸的小平头，衬着一张白皙的小圆脸

儿，使我联想到蒲公英。他象飞蛾见了灯光似的，在我身前后转悠，伸着脖子看我的镁光灯。

对这号人物我不能不稍加警惕——我们宿舍大楼里就有这么几位，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是出其不意地把足球踢进你的窗户，就是冲锋陷阵般地追击老黄家养的几只母鸡；每到假日，他们能把楼顶震得象窗户纸那样颤动，弄得你成天神经紧张，心绪不宁……

看，这穿红背心的孩子，果然向我的镁光灯动手了：他想摸摸那晶亮的灯罩。我没好气地问道：“你要干吗？”他毫不客气地说：“叔叔，您把这玩艺儿打开，让我看看亮不亮，好吗？”我冷冷地说：“不好！”他似乎根本没注意我的语气，仍然笑眯眯地跟我缠：“叔叔，这叫什么灯呀？它特别特别亮吧？”我没再搭理他，自管走了。

我没体验过做父亲的滋味，对孩子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腻烦。没事儿的时候，逗逗他们倒满开心，可以休息休息脑子。但是，跟他们的关系，可要保持一定温度，太热乎就要招来许多麻烦——这是我的经验。

找到了展览小黑猩猩的铁笼，我好不容易挤到前排。嘿，运气真不错！小黑猩猩正进餐呢！它人模狗样儿地坐在一个凳子上，端着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牛奶，奶汁顺着嘴角淌下，象串串珍珠挂在黑茸茸的胸脯上。这是多妙的镜头啊！

可是，高兴得太早了！

我找好角度，对准光圈，等反光镜上的影象完全清晰

起来，就举起镁光灯，屏住呼吸按动了快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快门“卡嗒”一响、镁光象白亮的闪电放射出来的一刹那间，反光镜里小黑猩猩的影象，突然被一张人脸遮住了！

“谁？”我怒吼一声，抬头一看：迎面站在铁笼外水泥台上的，正是那个穿红背心的小孩！他拍手雀跃，欣喜若狂地喊道：“真亮呀，把我眼睛都照花了，多好玩呀！”我气得浑身发抖，刚想抓住他，他却象条红色的跳鱼，跃进人群里，眨眼不见了。人们都朝我大笑不已……

我憋住半肚子气愤、半肚子委屈跑回报社，老黄见了我，说：“你怎么跑得浑身大汗？家里又没着火！”我粗声大气地说：“没拍好，我是回来取胶卷的！”老黄一惊，喊道：“哎呀，那就要错过发稿时间啦！你怎么没拍好？把底片洗出来看看！”

一句话提醒了我：在那 250 分之 1 秒的时间里，也许拍上了小黑猩猩呀！可是，终于使我大失所望：底片上只有那穿红背心的孩子，歪着蒲公英似的脑袋，吐着小舌头，惊奇地睁大眼睛，好象在说：“真亮，真好玩呀！”

“这是谁？”老黄借窗外一线余辉，端详着这张照片，说，“好象不是小黑猩猩。”

我本想把一肚子的气和委屈，向他倾泻出来。可是没说几句，嗓子就象被什么堵住了，眼睛直发酸——这是我两年来头一次失职啊！

“算啦，我全明白啦！”老黄安慰我说。“我手头还有张

‘海滨游泳场’，先发上去。”

我说：“那我明天一早，就给小黑猩猩补拍去。”老黄说：“有空再去吧。明天你去给于锦莲拍照，文教组后天要。”

于锦莲这名字我知道，她是市人民代表，优秀的小学教师。我一定拍好她的相片。

晚饭也没吃好，现在可真饿得慌……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于锦莲的家，就在报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走进那座雅洁的小四合院的时候，年近花甲的于老师正坐在廊檐下写什么。她熟练地摇着一杆红头毛笔，嘴角眉尖漾着一丝笑意。微风吹动着鬓边的白发，宽阔的前额上一片静美的光。

我没有惊动她，轻轻绕过院子中间摆成正方形的几盆夹竹桃、石榴树和西番莲，从她的侧面拍了一张照片。她向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第二张照片又拍好了。

“你真会抓紧时机呀！”她象老熟人那样招呼我，请我坐在她身旁。把事先预备好的一杯茶水和一柄葵扇递给我。（听说当老师的心细，果然如此！）

“您忙什么呢？”

“批改作文呢，孩子们的暑假作业。”

我翻开一本：作文题是《快乐的一天》。一大片方方正正的儿童体钢笔字间，挤着许多红色的娟秀的蝇头小楷——于老师批改得真精细，每个字都写得那么工整、那么

美。

可是，当我瞥了一眼桌角上那厚厚的一迭作文簿时，又不觉怜惜起这位老人来：批改这么多《快乐的一天》，她大概要过好几个“辛苦的一天”哩！我们报社的编辑，一天看上十几篇稿子，不是就喊头疼吗？

“你看，”于老师以为我对这些作文很感兴趣，她很有兴致地指点着说，“这句话写得多好！‘我们不应浪费粮食，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还有这句：‘现在我们举着少先队的小红旗，将来要举革命的大红旗！’……我们小时候就写不出这样有思想的文字，一落笔不是‘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就是‘人生在世，当以衣食住行为先’；都是些陈词滥调，老气横秋。你再看看这些小文章——也许你会说孩子们的文章稚气、简单，可是它们是崭新的！孩子们所表达的这些稚气，简单的思想感情，却是我在旧社会五十年里所不能领悟的啊……”

于老师打开一本又一本作文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赞美着。眼里闪烁着由衷的喜悦，额上皱纹漾出欣慰的涟漪。

我开始感到这些方方正正的儿童体钢笔字，不仅仅是她工作的对象，而且是她欢乐和力量的源泉了。

“您做了多少年小学教师？”我问道。

“三十六年，”她说。“可是，越做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比如，你这镁光灯我就一点儿不懂；能跟你请教请教吗？”

真有趣！昨天那个穿红背心的孩子，对镁光灯很感兴

趣；今天这位老教师也感兴趣。大概我们这一行工作，很有吸引力吧？

说实在话，摄影记者的确比小学教师更适合我们年轻人——“穿过海洋，穿过波浪，今天这里，明天那方！”多带劲儿！当然，也会碰到倒楣的事，比如昨天，碰上了那穿红背心的孩子……

我兴致勃勃地把我的好伙伴——镁光灯，向于老师介绍了一番。

“太简单了！”她说。“你能不能拆开它，来个实物教学？”

“行！”我一边拆灯，一边问道。“您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吧？”

于老师笑了笑，把头那样一摇，象是说，你讲吧，反正我感兴趣。

晚上，把于锦莲的照片洗出来，送到文教组。他们很满意。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建军节的任务忙过去了。今天早晨，我去动物园补拍小黑猩猩的照片。

夜里，下了场透雨，动物园里的花草树木，格外娇艳。各样的鸟儿，唱着各样的歌儿，扑楞楞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上。

我沿着清幽幽的林荫路缓缓走着。忽见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有两只黑力士鞋。刚要捡起来，只听头顶上一声

大喝，

“别动，那是我的！”

一阵雨珠落在我身上。我仰头望去：浓密的绿荫里，闪动着一个小红点。不一会儿，两只小光脚丫从树干顶端探出来了。一个孩子抱着光滑挺拔的树干，象猴子似的直溜下来，溜得那么快，我的心不觉怦怦直跳。

我惊魂未定，那孩子已经溜到地上。啊，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替小黑猩猩上了我的相机的调皮蛋。

“原来是你！”我冲口说。心里添了一句：“真是冤家路窄！”

“叔叔，您又来啦！”他却象重逢故友那么高兴。

我抹抹脸上的水珠，问道：“你爬到树上干吗去了？”（奇怪，我一张口，语气就挺严厉。）

“叔叔，”他指指树顶，“那上头有一窝小鸟，许是小斑鸠（一会儿我去问问老师，看是不是，我们老师什么都知道），毛团儿似的，可好玩了！前天我看见两只大鸟，许是大斑鸠，往那窝里叼食，一趟又一趟的。我想：里边准有小鸟儿。夜里一下雨，我可着急了，可千万别淋坏小鸟儿呀！刚才我上去一看：嘿！小鸟儿好好的，一根毛都没湿……”

“可是，你知道吗？公园里禁止爬树，这很危险！”我决意要训训他。

他好象没听见，两眼又盯住了我的镁光灯，得意地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了：这叫镁光灯，里边有一种

什么药，叫……叫镁粉，对，镁粉！你一通电，它就……”

“好啦，好啦！”他这股快活劲儿，使我又添了几分气。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你做了什么事？”

“嘿嘿！”

“你看，”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他那张照片，“我没照上小黑猩猩，倒照上你了。”

他接过照片，两眼立刻笑成一对小月牙儿，说道：“挺清楚，你就送给我吧！”说着，相片已经进了他的裤袋。

原来他满不在乎。这真是给我火上浇油！我沉下脸，问他说：

“你多大了？”

“十一岁半。”

“是队员吗？”

“是！”

孩子的脸色发白了，他不住眨眼睛，似乎说：我怎么惹着你了？你这么大的气！

好吧，我就给你说个明白！

“你那天的行为，可不象个少先队员做的！”我的语气僵硬得象一根棍子，“我给小黑猩猩照相，不是玩儿，是工作！我是个摄影记者，你知道吗？”

接着，我就把他的恶作剧，怎样打乱了我们的编辑计划，使千千万万读者受了损失，加重地说了一通。

他听着，毫无表情。

“你太不爱惜红领巾的荣誉了！”最后，我有意要刺激

刺激他。“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的老师和同学，看你怎么办！”

他呆呆地站着，象块木头。突然，他拎起鞋，转身就跑，光脚丫在柏油路上叭唧叭唧响……渐渐消逝在甬路深处了。

我想：我做得很对，他终于感到惭愧了。于锦莲老师大概也是这样教育她的学生的吧？……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于锦莲的照片和事迹，在报上刊出后，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海防前线战士的，有北大荒垦荒队员的，最多的还是小学教师和各地师范学校学生的，他们热情赞扬于锦莲的工作，表示愿意向她学习。

晚上，我顺路来到于锦莲的家，打算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她。这时，于锦莲最小的女儿（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坐在院里灯下看书，她见我来了，就向屋里努努嘴，压低声音说：

“昨天下午，有个男孩子跑来，把一条红领巾往妈妈怀里一塞，哽咽着说：‘于老师，我不配做少先队员了，不配了！’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哇地哭起来，扭头跑了。

“刚才，她到那个孩子家里去了，他没在家，家里的人也没提供出什么情况。据我估计：那孩子一定闯了什么祸，自尊心受到了刺伤。”

啊，我来的正是时候，可以宽慰宽慰老人家。

“于老师，”我进屋抢先找高兴的事儿说，“您的经验和照片见报后，读者反映非常强烈！我们每天要收到好多封信，有教师的，有家长的，都表示要学习您耐心教育孩子的精神！”

可惜，我的话适得其反。于老师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一条红领巾迭成个长方形，忧心忡忡地说道：

“我离人们的期望差得远呢。”

“不能这么说，”我极力宽她的心。“孩子闯点儿祸很难免，也许这孩子真做错了什么事，大人训训也应该嘛！”

“不，教师没权利说这种话。”于老师把那方红领巾放在膝头抚平，象爱抚着一个孩子的头发似地说。“这孩子好奇心盛，勇敢，自尊心很强。同时，也顽皮，好惹事生非。对待这种孩子必须细心，就象给谷子间苗，稍一大意，就会把谷苗当杂草拔掉。”停停，又说，“这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不知道。回头我还要去找他。”

她的小女儿进来说：“妈，天晚了，路又远，您明天再去吧。”于老师笑道：“不摸清情况，我会失眠！”

.....

我告别了于锦莲，在晚风习习的街上踱着，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比起于锦莲来，我太差劲了！昨天，我对那个穿红背心孩子的“教育”，完全为了自己出气，是否会刺伤了他的心？会无意中“把谷苗当杂草拔掉”了呢？

对，明早我应该到动物园去找他，平心静气地跟他谈谈。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在动物园转了一大早晨，毫无所获。穿红背心的孩子倒有几个，可惜都不是他。我在那棵大杨树下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听树上的小鸟啾啾叫着，耳畔响起了那两只小光脚丫叭唧叭唧的声音。

我越发明白了：那天，那穿红背心的孩子跑到我镜头前面来，只是想看看镁光灯怎样发光，并没有存心破坏我摄影的念头；正象他爬上这棵大杨树，只想看看那窝小斑鸠是否被雨淋坏，并不想侵害它们一样。

唉，我也许真的是委屈他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雪下了一夜。清早，摄影组全体出动，给在风雪里坚持工作的人们——清道工人、交通警察、流动售货员，以及描绘雪景的画家拍照。这一组照片，将以“凛冽的风雪，火热的心”的标题，载于下一版“星期画刊”上。

我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给一位年轻的交通警察拍照。他站在银妆素裹的背景中，指挥往来的车辆。风卷积雪扑打在他的身上、脸上，他的黑皮短大衣象铠甲一样闪闪发光，愈显得英气勃勃。

我找好角度，站在人行道上准备拍照。

可是不行。正是上班、上学时候，行人穿梭般地在镜头前来来往往。我几次端起相机，都不得不在匆匆闪过的

人影中放下了。

真是无可奈何！谁愿意在这零下二十多度的街头停留？况且，风卷雪扬，人们埋头赶路，怎会注意到我这摄影记者呢？

我冻得浑身打战，手脚也开始麻木了。最要命的是：再这样下去，怕拍不成了！

我再一次端起相机时，又听身旁有人走来，不，是跑来的——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上，开来了一部汽车，人们急着赶车去。我叹了一口气，刚要放下相机，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

“大家站住，人家照相呢！”

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蓦地停止了。

我忍不住感激地向旁边膘了一眼：一个穿蓝灯芯绒夹克，系着红领巾、戴着护耳皮帽的男孩子，张开胳膊，站成了“大”字形，拦住五六个比他高出一头的行人。他还不住向后面跑来的人喊道：

“同志，禁止通行半分钟！”

人们都被他那机灵、幽默的样子逗笑了。

我心里一动：这孩子的音容笑貌，多么眼熟啊！看，他好象也在辨认我呢，小眼睛不住眨呀眨的……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我迅速拍好照片。

人们象阵风似的冲过去，依次登上了那辆汽车。那孩子等大家都上去了，才抓住把手，纵身一悠，轻捷地跳进车厢。车门“嘶——”地关上了。

“他是谁呢？”我紧张地从记忆里，搜寻那张熟悉的面孔。忽然，一个毛茸茸的、蒲公英似的小脑袋，从一扇车窗探出，一只手摇着护耳皮帽，

“摄影记者叔叔，再见！”

“是你！”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夏天在动物园和我打过两次交道的那个“穿红背心的孩子”。可是，我的喊声未落，汽车的马达响了。我目送着汽车，直到他变成个小红点，渐渐消逝在茫茫的风雪中。

阳光从绽裂的云缝里喷射出来，周围世界一片光明耀眼。我心情欢愉地往报社走，觉得肩上的相机重了许多——这里边跳动着一颗少先队员的心啊！更使我高兴的是：这孩子变好了，从妨碍别人工作到帮助别人工作了！四个多月来，谁为这棵“谷苗”，浇灌了品德的泉水呢？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广州，开始驻外地记者的生活了。午后，买了车票回到报社，听说第一会议室有个座谈会，文教组召集的，于锦莲也来参加，我就想顺便去跟她老人家告别一下。

离开会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于锦莲和一位梳小辫的青年教师，已经坐在会议桌旁了，她们在亲热地交谈。她穿着件藏蓝色斜襟小棉袄，脸色红润，精神奕奕。

“于老师，”我上去和她握手，“我明天就去广州工作了。”

“啊？”她拉我坐下，“广州的老师们有什么经验，可要给我们介绍过来呀。”

“一定！”我痛快地说。“我对儿童教育已经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这是实话。自从那个风雪的早晨以后，我经常怀念那“穿红背心的孩子”，象怀念老朋友似的。说也奇怪，近来我特别喜欢跟孩子接近，特别是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从他们身上，我总能看到那“穿红背心的孩子”的影子；不管他们多调皮，我也相信他们会茁壮地长起来。我愿意给他们讲革命故事，愿意给他们当乒乓球裁判，渐渐地，他们也喜欢我了，肯听我的话了。所以，老黄开玩笑说：“你成了大楼里的孩子王。”黄大嫂还说：“到了三八节，我们大楼里开妇女联欢会，一定请你参加！”……

我把这些情况，一气儿说完，于锦莲喜形于色，她问我怎么对儿童教育发生兴趣的，我就把去年夏天，在动物园和那孩子的两次遭遇说了一遍。

于锦莲听着，眼睛眨也不眨。当我说到那个风雪的早晨，那孩子怎样帮助我拍成一张交通警察的照片时，她的表情先是惊奇，仿佛听见了一件重要的新闻；继而是喜悦，一种出自内心的、深沉的喜悦，我看见老人家的眼睛变得格外明亮了。

于锦莲用力握住我的手，仿佛要说什么。这时，又有几个参加座谈会的教师进来了，他们都尊敬地同于锦莲打招呼，使她顾不得和我说话。